

欧洲阶级体系的转型以及中产阶级的飘零

路易·肖韦尔*

路易·肖韦尔(Louis Chauvel) 2009, “欧洲阶级体系的转型以及中产阶级的飘零”(“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class system and the middle classes adrift”), in 李春玲 (Li Chunling) 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Formation of Middle Cla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cess, Influence and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北京 (Beiji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p.371-396.

一 导言

在国际的比较数据中，法国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被视为拥有舒适的生活、均衡的经济、稳定以及较好的社会保障的典范，这有利于在福利国家的强力支持下发生的处于社会中间部分的中产阶级的大范围扩张（“中产阶级化”）。然而，社会现实以及最近 20 年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结果。

这种变化主要是随着 20 世纪 50~90 年代基于“阶级消亡”理论的步调而产生的：阶级问题几乎在过去的 20 年中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里消失了，尤其在法国。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经验层面，有两个不同的时期清晰可见：一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级之间的客观差距在缩小；另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演变趋势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不平等在重新结构化，但又未产生某种集体意识以组成阶级。这两方面的分裂——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造成了一种“社会化障碍”现象，即一种双重制约在破坏普遍的阶级认同，客观上看得见不平等存在着，但是主观上却没有任何建构，这也意味着，社会阶级的未来依然是开放的。

* 路易·肖韦尔 (Louis Chauvel)，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变迁研究所教授。

对于各种中产阶级的定义及理论的复兴展示了另一种景象——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产阶级是复数。古斯塔夫·舒曼勒（Schmoller, 1897）着重强调了用于区分中产阶级群体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的两个取向：前一个取向区别了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而后一个取向则将中产阶级划分为基于市场传统的老中产阶级和基于技术的新中产阶级。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下层的技术型中产阶级获得了急剧的扩张，而现在，一种反馈效应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新生代面临着坐拥经济资产的上层中产阶级的新一轮的扩张而受到挤压。通过对长达 30 年的跨时段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以及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平等化的增长阶段之后，新生代们面临着一种非平等化的停滞情况。一个隐含着挫折和失范的巨大风险正是这种新趋势造成的结果。

就像很多其他后工业化国家一样，当代法国是一个被普遍认为社会阶级对于理解社会变迁并无多大帮助的地方。在过去 20 年里，阶级结构的未来并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而只是一个过时的东西、一个很少被考虑的问题，而且似乎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禁忌。然而，过去 20 年里阶级这一问题的讨论或多或少有些过于被禁锢了，实际上，对当代阶级的形成及其结构的社会学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比后实证主义的主流法国社会学所描绘的更为矛盾的景象。即使只是以法国为分析对象，它同样反映并刻画出了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发生的那种十分明显且广泛的变化（见图 1）。这些国际的比较显示出这些欧洲大陆国家在 2000 年大部分都已达到了发达的、舒适的水平并实现了平等。收入分配的图形在曲线的中心部分聚集，而大部分的人口则集中在平均值附近（见图 2）。

本文旨在描述法国主流（官方）的基于阶级消亡的假设——这种假设与美国学者的著作《社会阶级的下降与衰落》（*Decline and Fall of Social Class*）的观点没有什么区别（Nisbet, 1959）。澄清“社会阶级”这一概念的含义并提供一个在主流假设和过去 20 年所提供的经验证据之间进行对质的机会。对所有可收集到的数据的动态分析显示出主观阶级认同的弱化，即客观上的经济平等化进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停止了——在经历了之前的 30 年（被称为“30 年荣景”，1945~1975 年）（参见 Fourastié, 1979）“黄金时代”之后。一个更为深刻的矛盾由此产生，社会阶级的客观层面与主观层面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变化趋势——客观的经济不平等在增加而主观的阶级认同在弱化。对此进行一种长周期的数据分析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假设。

需要强调的
着重强调
句区别了中
专统的老中
朝，下层的
明显，那就
到挤压。通
及劳动力市
面临着一种
新趋势造成

会阶级对于
来并不是一
而且似乎变
论或多或少
析向我们展
即使只是以
的那种十分
国家在 2000
图形在曲线

种假设与美
class) 的观
义并提供一
对所有可收
平等化进程
“30 年荣
个更为深刻
互矛盾的变
进行一种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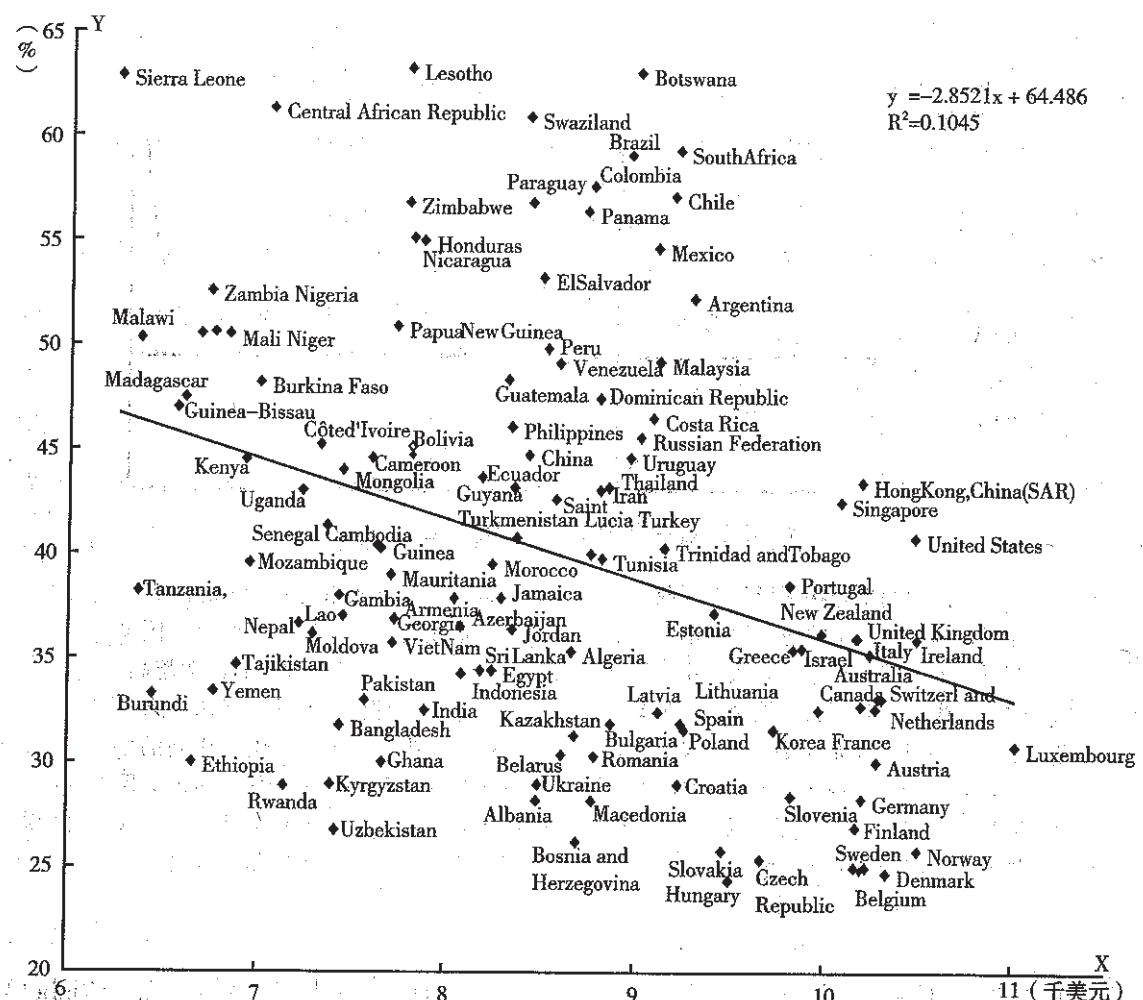


图 1 2000 年国际 (横向) 及国内 (纵向) 的不平等

注：X 轴为人均 GDP 的美元购买力平价 (PPP)，此指标代表经济富裕程度；Y 轴为基尼系数，代表国内的不平等程度 (2000 年)。图中的黑点分别代表各个国家*在这两个坐标分布中的位置，欧洲国家 (包括法国) 大多处于图表中的右下角，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富裕且平等化程度高。图中的斜线是以 Y (基尼系数) 为应变量；以 X (人均 GDP) 为自变量而产生的回归线，回归方程显示在图的右上角。

*因图表难以转换，图中的各个国家的名字保留了英文原文。

二 社会阶级：20世纪 70 年代被奉为图腾

而过去 20 年里则成为禁忌

1968 年之后是一段充斥着社会批评、左翼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塑造的时期，在那个时期，法国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崩溃之后，有关社会阶级终结的假设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学界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尽管如此，法国有关阶级的争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雷蒙德·阿隆 (Ar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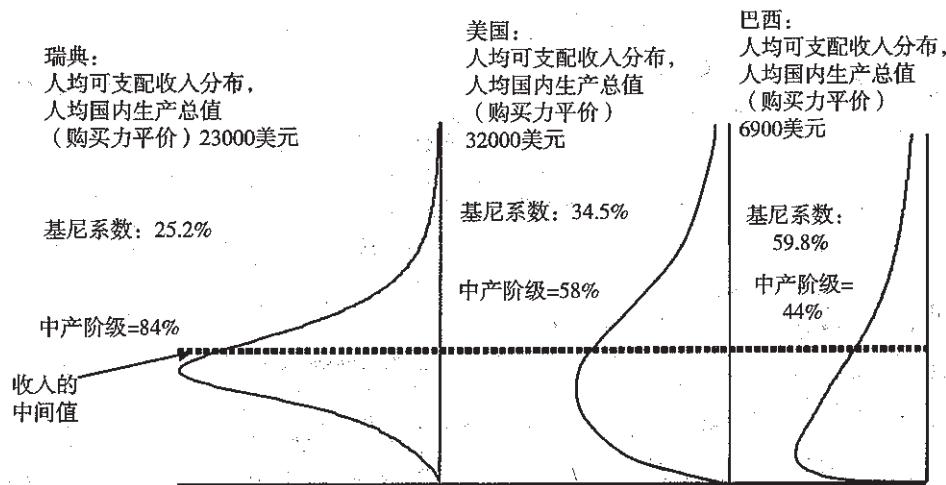


图2 国家金字塔形态的比较：国家中值*

* 图中的果球状图形代表了收入分布形态（即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所占的比例），虚线代表收入的中间值，果球图形越突出、其顶端越接近中值虚线，表明这个国家有越多的人集中在中等收入，中产阶级（按收入指标定义）在人口中的比例越高，收入分配越平等。三个国家的图形显示，瑞典（左边的果球图形）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的 84%，基尼系数为 0.252，这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典型形态；美国（中间的果球图形）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的 58%，基尼系数为 0.345；巴西（右边的果球图形）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的 44%，基尼系数为 0.598，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社会的典型形态。法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应处于瑞典与美国之间，中国的情况应处于美国与巴西之间。——编者注

1969) 是第一位引发这个争论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引入了尼斯伯特 (R. Nisbet) 的经典问题：“社会阶级正在消亡吗？”(Nisbet, 1959) 而最近克拉克、李普塞特 (Clark and Lipset, 1991) 以及金斯敦 (Kingston, 2000) 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显著复兴。阿隆遵循着一条与尼斯伯特相近的路径。首先，“第三次革命”(基于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后工业经济的出现) 暗示着一种新社会的形成，其中的阶级边界正变得（用尼斯伯特的话来说）模糊甚至不清楚。其次，工会的发展及其制度化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更好的表达途径，并且更加重视工人的利益。再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社会的丰裕以及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使得各种产品从上层社会逐渐向下层扩散，从前的消费界限逐渐被打破：汽车、郊外别墅、真空吸尘器、烤箱等，这些都曾经是区分不同阶级之间消费标准的象征，但现在已没有什么产品可以明确或长时期用来代表这种社会边界了，而它往往能够形成稳定、清晰的阶级认同感。阿隆和他的追随者们所采用的数据资料远少于戈德索普和埃利亚——他们主要研究工人阶级富裕化所导致的后果，但阿隆和他的追随者们依然发展出了不同的新观点，比如所有权的扩散、教

育及大学的普及、劳动力市场中女性人数的增加以及世代交替的结果。（“由一个工人和一位学校教师组成家庭从阶级角度来看又该在什么位置呢？”）

实际上，阿隆的第一次努力在面对“70年代思潮”时很快就失败了。在这10年中，从1968年5月到80年代早期，一场大范围的理想化的社会批评运动形成一种（过于）重视阶级的氛围，并认为这才是所有社会变革的原动力（*primum movens*），这一运动在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1981年法国总统选举的胜利时达到了高潮。与以往一样，过度的政治激进主义引发了一系列的反馈效果：1981年再次当选的社会党人，于1984年在“不可缺少”（“Rigueur”）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经济政策的重大改革，这种政策是一种停长工资、对通胀采取货币主义控制方法的混合物，最终形成了资本收益、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加速积累，而这一切都是以被雇用工人们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的（Todd, 1995）。在诱人的发展成果面前，以前投身于阶级分析甚至阶级斗争中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阶级不再存在”这一理念的最强烈的支持者。大部分改革派的社会学家和左翼的社会思想家^①都认为：现在，社会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概念。更为普遍的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在法国社会学博士的论文题目中出现了“阶级”这个词——这个词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次数急剧下降——那么马上将其按照“Rigueur”的阶段进行意识形态转换才是合适的；只要查一查法国国家图书馆（BNF）的分类目录就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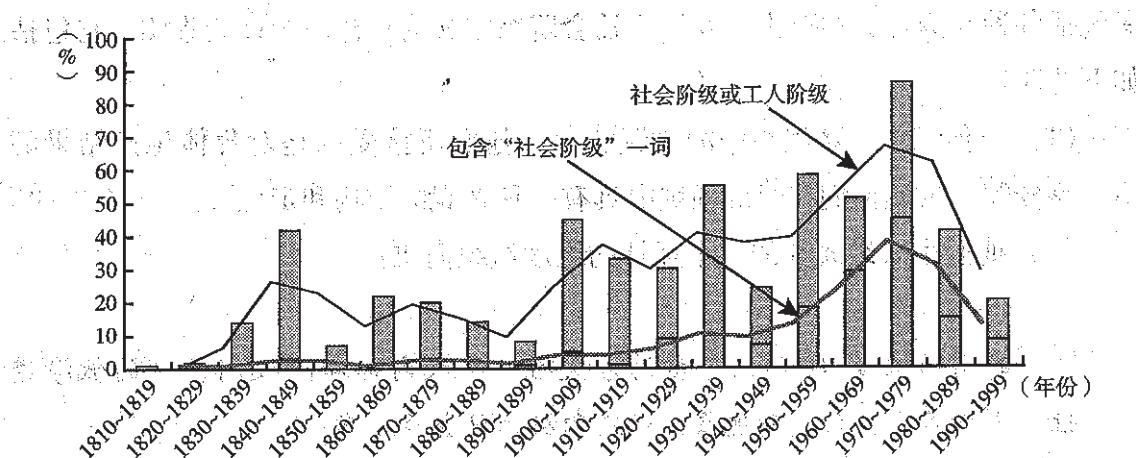


图3 法国国家图书馆(BNF)的目录中包括“阶级社会”或者“工人阶级”题目的论文数量(20年来每10年的变动平均数)

资料来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catalogue*。

① 甚至包括 Touraine (1969) 或 Dubet and Martucelli (1998)。

三、“社会阶级”的定义

法国有关阶级消亡争论的问题在于，论战者偷换了他们所使用的社会阶级的定义：大多数保守的社会学家更倾向于使用一个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在一个充满了剥削和压迫性“社会交往”（rapport social）〔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① 的社会里，阶级是一个被强有力地组织起来的强调整体性的集团，它以强烈的阶级意识为标志，被动员与其他阶级进行暴力斗争；按照这样的定义去分析，结果肯定是在当代社会中这样的“阶级”完全消失了。相反，前阶级派（pro-class）的社会学家倾向于一个宽松的、名义上的、韦伯主义式的阶级定义，即阶级仅仅是拥有共同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拥有在市场中相似的社会生存机会的一类群体，而这样的定义有利于在后工业化国家中开展针对阶级的较为轻松的相关研究。既然连定义都还是含糊的，那么对各类证据的明显操纵就会反复出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法国背景下的阶级变化情况做一个分析，那么在这里一种以经验为主的阶级定义就是必需的了。事实上，这里所用的阶级定义是一系列关于“阶级状况”（classness）的要素，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严格的二分法的定义——诸如“结构 A 属于一个阶级社会”而“结构 B 就不属于阶级社会”。我们的定义包括各种互为补充的要素，我们将社会阶级定义为这样一个社会集团，它包括如下特征。

- (1) 与他们在经济组织中的位置相比，他们所接受的是对集体生产结果的不平等分配，由此他们在经济领域中具有一种客观的结构和定位；
- (2) 他们由阶级属性的三个互补的维度组织而成：

时间的维度（2a），分类的永久性，阶级内部和阶级间流动的低渗透性，很少存在世代交替现象，以及积极的社会再生产；

文化的维度（2b），这是一系列大量的日常象征符号的详细参照物，共享着一种集体间互相认识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接受或拒绝共有的相同象征符号参照物的能力；

^① 在法语中，“rapport social”是一个比“social relation”更为强烈的表达；前者含有一种强烈的各方角力的意味，而后者是一个更为中立的词语。

集体的维度 (2c)，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在阶级联合的政治领域与其利益之间存在认知矛盾。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三个维度可以用来区别各种社会团体：社会阶级、性别、种族、地域和宗教等。而我们的定义中第一个经济方面的客观特征就是唯一一个明确与阶级定义相关联的。对于这个定义的一个广泛的批评就是明显过于经验主义了，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发现：这其中没有一处清晰地涉及剥削，或者统治之类的界定。这里并没有提到任何有价值的理论。因为这个定义并不是源于对阶级形成起源的研究，而是想发现其经验上的特征。这个定义的好处就是，它提供了一系列关于“阶级”的系统经验验证因素，或者是关于宏观职业群体的阶级组织程度的指标。毫无疑问，剥削程度将会导致经济上的差距并且这会影响已观察到的不平等情况的程度。这里的主要意图就是，对“阶级形成”进行诊断要远比解释它更为重要；而这一诊断在法国就是：真实的罢工！

四 “30年荣景”和“中等阶级化”

我们能够看到在法国对阶级这一话题的社会关注度的轨迹：在经历了1968年对“社会阶级”着迷般的分析之后，这一概念日益成为一个古老的旧概念。在这一时期，法国阶级体系发生实际演化究竟如何？在“30年荣景”（法国经历的经济快速增长和日益富裕的黄金时代）期间，可以明显地观察到阶级状况的一种在客观上趋于集中的趋势。

首先，在经济方面，底层（白领和蓝领普通工人）的经济状况受益于他们收入的快速增长：与1913年相比，生活的平均水平（包括每个消费个体的税后和转移收入）翻了5倍多，而最高收入的百分位数只翻了2倍（Piketty, 2001a; 2001b）。其他的一些分析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种强烈的平均化趋势（即使这一趋势并不总是能完全达到）。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社会福利，那么工人在健康、退休、工资稳定性、工作环境等生活水平方面的提高更为明显，这主要得益于社会谈判和社会斗争。其次，在文化和消费方面，可以发现一种独特的带有前工人阶级特点的情况日益突出，最明显的是休闲、度假、迁移（汽车的普及）以及建房（拆除老的廉价的公寓以新的规格重建，甚至可以拥有个人的私

有产权)。再次，在教育方面，尽管有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Bourdieu and Passerson, 1964; 1970)，但是整个社会环境中对儿童的中等教育的日益普及模糊了以前的阶级界限。^①

很多社会趋势看起来是在鼓励一种对社会阶级体系变化倾向于潜在集中的乐观观点。^②因此有了法国的“中等阶级化”(moyennisation)理论(Mendras, 1988)。实际上，“moyennisation”是一个几乎不可翻译的词汇，因为法语中的“中等阶级”(classes moyennes)和英语中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意思。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社会学界来说，中等阶级是一个接近于严格的平均收入(包括高层领班、技术员、护士、中小学教师、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等)的社会阶层，正如图尔瑞因(Alain Touraine)所定义的“新的中等工薪阶级”(nouvelle classe moyenne salariée) / “新的中等雇员阶级”(new employed middle class)(Touraine, 1969)那样。所以“moyennisation”更适合翻译成“均等化”(avérégisation)而非“中产阶级化”(middleisation)，因为在英语中，中产阶级是指一种稍高一点的社会阶层，一种在无产阶级和上层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有闲阶级”(comfortable class)，其成员更类似于较高地位的职员、专家、管理者和工程师等。中等阶级化不仅是这类阶层在人数上的膨胀；它更表明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个在无产阶级和旧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三势力”(tertius gaudens)的兴起，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交往”(rapports sociaux)[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文化和消费习惯(摇滚、野餐和牛仔裤)并打破了旧有的统治结构(Mendras, 1988)。那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呢？如果我们仅把这些观点看作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变化趋势的一个诊断的话，那么中等阶级化毫无疑问是对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不平等并没有像20世纪前半期那样严重，而且1945~1975年或1980年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这一理论旨在描述当代的变化，或者成为一种标准的预言，甚至是一种诊断——认为我们正经历着所有社会阶层都进入一个单一的“均等”

^① 很明显，布迪厄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再生产的永恒趋势的理论，然而对教育的社会不平等的趋势分析并不等同于对再生产过程中的历史变化的分析：就结论而言，这些分析应当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② 那时，现代性的定义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明确，因为普遍进步的观点已经明显形成(Therborn, 1995)；在分析不平等方面，对底层阶级经济停滞情况的影响效果的分析更支持我们前现代性的观点而非后现代性。

阶级里面这样一种拥有完美集中趋势的平等主义体系中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将会是错误的，而且对于理解当代的变化趋势更加不适合。

五 社会阶级真的消亡了吗：一个客观的再阶级化

让我们由此转向对当代法国的中等阶级化的判断：在客观方面，各阶级的社会位置真的越来越平等且各阶层之间的社会边界真的变模糊了吗？我们提出了一些用以评估法国各社会阶级的客观经济结构地位的指标。总的结果显示，以前那种持续的客观阶级结构上的模糊趋势已经不再明显了，实际上，该过程在某些水平上反而呈现一种相反的逆转情况。

我们必须记住，历史上，在法国的社会争论当中，职业不平等和阶级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官方所认可：从 1954 年确立“社会职业目录”（*Catégories Socio-Professionnelles*, CSP）开始，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阶级模型”（class schema），类似于戈德索普的那个阶级模型的逻辑（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展开经验层面的广泛讨论而不必使用“阶级”这个词汇。CSP 模型定义了 6 种主要的职业群体（模型中更为详细），这样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① CSP 的编码有双重作用：首先，在过去的 50 多年里，模型只有在 1982 年才被更新过一次；其次，这个模型可以被任何一个大型社会调查所用，因此它可以提供关于阶级结构变化的长期比较数据。使用 CSP 可以证明很多“阶级消亡理论”所争论的相对性，甚至错误性。

首先，“阶级消亡理论”源于“工人阶级的消亡”（这是指在劳动力当中蓝领工人比例的减少），而这一点与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相比是不证自明的。在法国的 CSP 阶级模型中，我们将第三产业（信息和服务行业）中的雇员和第二产业中的工人（ouvriers）（蓝领工人，blue-collar workers）界定为结构平等的一类人：

^① 在法国的统计体系中，这些“社会职业目录”（CSP）是一种官方的职业分类标准，没有可选择性，也没有人能够逃避（Desrosières et Thévenot, 1988）。干部（Cadres）是高级职员、管理人员和高等级的专家；中等职业（professions intermédiaires）是第二等级的职业；雇员（employés）是普通的白领和服务工人；工人（ouvriers）是蓝领工人；农民和业主（agriculteurs and patrons）是那些在农业和其他个别行业的自雇佣者。这些名称被官方和私人的统计机构广泛使用并且成为被个体采纳用以描述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的有效工具。

雇员和工人拥有相同的收入水平、相似的受教育程度、在职业等级（日常类型）中被指派给同样的责任，并且被认为是“大众阶级”（classe populaire）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对这方面过去 30 年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提供所谓“工人阶级消亡”的清晰证明：即使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重从 40% 下降到 30%，雇员的比例却随之上升，以至于在过去 30 年里雇员和工人的综合比重在整个劳动力中已经占到了 60%，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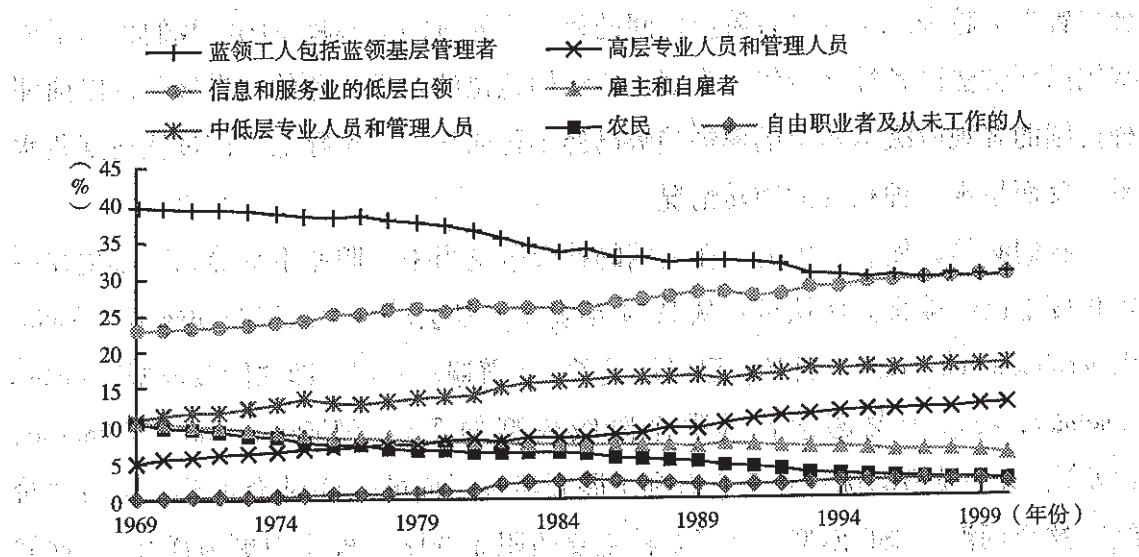


图 4 法国劳动力中职业群体的分布 (1969~2000 年)

其次，关于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界限模糊的争论是认为各社会阶级之间的经济变化越来越平等化。这是尼斯伯特的主要观点之一：由于工人阶级消费习惯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富裕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模糊了社会阶级划分。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尼斯伯特的理论：按照他的理论，经济停滞应该会强化阶级区分，因为阶级之间在增长方面的时间差距或停滞会导致重新分化。

在过去的 10 年里，职业群体之间的静态经济不平等看起来已经有所下降 (Chauvel, 1997)：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工资比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是 1:4，在 90 年代早期开始减弱变为 1:2.5。在十分位比率^①方面，变化较为温和，

^① 十分位比率是指人口中收入最高的 10% 的收入水平与最低的 10% 之间的比例。十分位比率是测量不平等的最常用的手段。

因为工人工资比例结构下降的一部分是缘于 70 年代中上层的专家和管理人员收入的迅猛增长。即使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工资之比已经下降幅度很大，十分位比率还是没有什么反应。然而，在这些对不平等的统计测量背后，尼斯伯特的观点暗示了另一种基于不平等变化的指标：在给定的增长水平下，工人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追赶上干部的工资水平呢？追赶的时间差距是一种对职业经理人和工人之间生活水平的社会距离进行测量的方法。滴入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y）的概念就是基于下层阶级通过观察上层阶级的经济状况而产生的对自身经济前景的一种预期。很明显，由于一种齐诺悖论（Zeno Paradox）的存在，这种追赶是不会完成的。因为存在着时滞，上层阶级的收入又会增加，而这保持着一种基于发展预期的客观距离。过去 50 年里的追赶时滞可以计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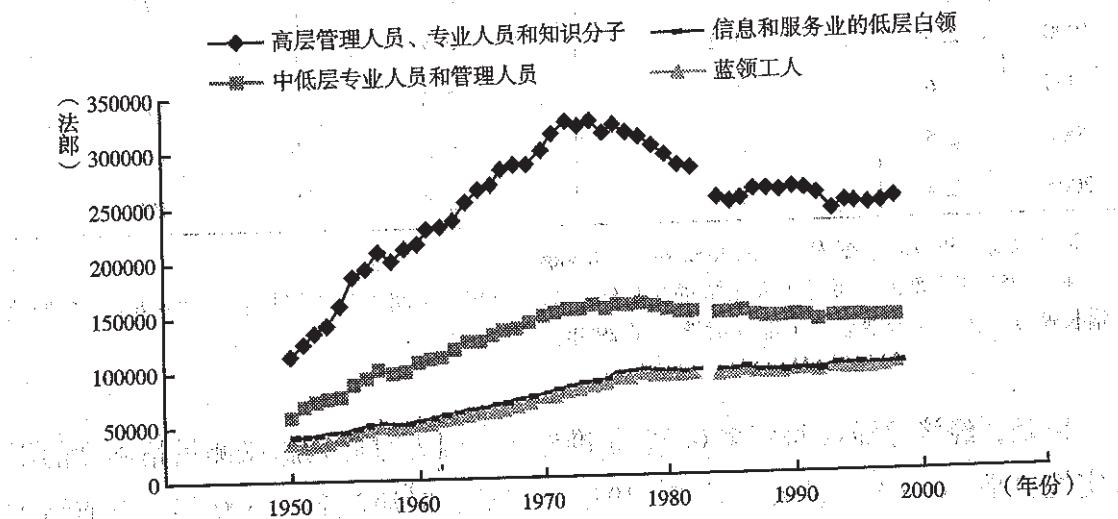


图 5 全职的雇佣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以 2000 年法国法郎为单位 ($=1/6.5$ 美元)

资料来源：INSEE 数据库：Long term series on wages。

结果是相当惊人的：即使对不平等的统计测量显示阶级差距逐渐缩小（主要在 20 世纪 70 年代），而在此之后阶级差距的动态变化证实了它正进入一个缓慢增加的新时代。在“30 年荣景”的快速发展期，追赶的时滞大约为 30 年，这是根据实际增长率为 4% 计算得到的，也意味着如果收入翻番的话这个数值会少于 18 年。另一方面，少于一代人的时滞主要是基于现实过程的结果：对于一个年轻的工人来说，他的生活水平在他退休之前可能赶上干部的水平；而对于一个年老的工人来说，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子女们的生活条件与他自己相比只能预期是一种机械的增长。

表1 追赶的时滞

单位: %, 年

年份	干部/工人 工资比 (A)	收入最高的 10% 与收入 最低的 10% 的全时工资比	最近 5 年全日制工作者 年平均工资增长率 (B)	工人赶上干部工资的时间 距离(时滞) = [log(A)/ log(1+B/100)]
1955	3.9	3.5	4.8	29
1960	3.9	3.8	2.8	49
1965	4.0	4.1	3.5	40
1970	3.8	3.6	3.7	36
1975	3.4	3.4	3.5	35
1980	2.9	3.2	1.6	65
1985	2.7	3.1	0.3	371
1990	2.8	3.2	0.3	353
1995	2.6	3.2	0.3	316
2000	2.5	3.1	0.6	150
2005	2.4	3.0	0.5	190

资料来源: INSEE 数据库: Long term series on wages。

注: 1955 年干部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 3.9 倍。1950 ~ 1955 年间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4.8%, 按照这一增长速度, 工人工资滞后于干部(时滞)是 29 年。

但是, 经济停滞(每年多 0.5% 是准停滞, 因为对通货膨胀测量精确度的不确定性也是 $\pm 0.5\%$) 扩大了时滞: 1975 年以后, 时滞跳到了 300 年, 以前缩小差距的时间少于 1 代人, 而现在则需要 10 代的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的结果。这个新的动态变化随着时间形成了新的分层, 因为现在对生活条件预期的阶层数量间隔比“30 年荣景”时期更为稳固。

事实上, 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特别是和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相比, 对不平等(如工资和收入的十分位比率)的测量没有显示出像法国不平等那样的快速增长。但是, 这些不平等比率的稳定性背后隐藏了让人并不乐观的观点, 这个观点在我们观察不平等的世代动态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Chauvel, 2002)。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贫穷是对老年人的诅咒, 是被社会发展所淘汰的老年人的下场。现在, 受贫穷困扰的更多的是 35 岁以下的人群, 而不是 75 岁以上的人群: 贫穷者是年轻人, 这预示着一个长远的贫穷的未来。很明显, 对那些在学校和工作上表现出色的年轻人, 生活相对是安逸的, 但是, 这个群体和资格较低的工人的差

距在逐步扩大。对于那些1975年后的青年人，即在1955年出生的那批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在1970年达到顶峰的集体主义计划（平等、稳定和广泛的社会保护措施）在慢慢减少。一个新的社会金字塔重新建立起来，在其底部，有一代人易于受到剥削和被社会淘汰。因此，静态不平等测量的稳定性隐藏了一代人趋于更大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表2 1995年家庭年度预算的各项支出比例和干部/工人的差距

消费品	(A) 占家庭支出的 比例 (工人)	(B) 占家庭支出的 比例 (干部)	(C) = (A) - (B)	单位：%	
				工人与干部支出的 绝对差距	(D) = (A)/(B) (B=100) 干部与工人 支出的相对比率
烟草	1.95	0.67	1.28	291	
面包	1.21	0.54	0.67	224	
汽油	4.38	3.16	1.23	138.6	
熟食	2.73	1.80	0.93	151.7	
电费	2.18	1.39	0.79	156.8	
动手修理及工具	1.05	0.60	0.45	175	
肉食：牛肉	1.20	0.73	0.47	164.4	
肉食：鸡肉	0.62	0.30	0.32	206.7	
燃料：瓶装汽油	0.26	0.06	0.20	433.3	
肉食：猪肉	0.45	0.20	0.25	225	
.....					
周末消费	0.05	0.18	-0.13	27.7	
交通费(公车、地铁等)	0.64	1.12	-0.48	57.1	
房贷还款	0.29	0.62	-0.33	46.8	
租车费	0.03	0.17	-0.14	17.6	
书籍费用	0.29	0.83	-0.54	34.9	
送礼费用	2.11	3.60	-1.49	58.6	
餐馆就餐费用	1.13	2.29	-1.16	49.3	
房屋修理	1.23	3.17	-1.94	38.8	
度假支出	2.02	4.66	-2.64	43.3	
家务服务费用	0.04	0.68	-0.64	5.9	

资料来源：Budget des ménages 1995, enquête obtenue auprès du LASMAS – IDL/IRESKO; ménages dont la personne de référence est âgée de 18 à 65 ans, de CSP cadre ou ouvrière.

如今，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阶级间的客观不平等是很小的，因为干部和工人的工资比是 2.5:1，这根本就没什么，而且证明了在生活水平和文化意义上完美的平等。这样的观点并不能经受经验分析的考验。在布迪厄发表《区隔》(Bourdieu, 1979) 后的 20 年，和哈尔伯瓦彻斯倡导的分析 (Halbwachs, 1905; 1913) 后的一个世纪，干部和工人的生活标准仍然是有显著区别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仍然牵涉到消费习惯和获得物品机会中的大量不平等。基本消费如原料、主食、烟草、能源仍然是下层的主要代表性消费，而上层的消费特点仍然是昂贵的或者文化方面的选择性消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Chauvel, 1999)：近 20 年，工人阶级和职员阶级的消费模式并没有清晰的一致性。除了消费，许多学者证明了职业地位和 CSP 模型在选举方面有持续的影响效果 (Boy and Mayer, 1997; Héran, 1997)，即使大多数国际理论已证明政治行为中的阶级决定因素的必要性有所衰退。

事实上，新尼斯伯特主义的理论家通常忘记了另一个问题，即所谓“30 年荣景”并不仅仅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快速膨胀的时期，也是“社会权利”(droits sociaux) 大量扩展的时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一方面，应对主要社会危机（健康、老龄化等）的准备是在个体水平上进行组织的；而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无组织的，因此实际结果往往是他们无法获得保障和资本积累。由于强制退休的政策和有关健康及社会保障的措施带来的共有化 (mutualization)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了“工资社会”(société salariale)（以工资为基础的社会和福利，Aglietta and Brender, 1984）的形成，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在那里，退休者的社会权利很少取决于资本的不平等，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工作分层。由于工资不平等是基于 1/3 的十分位比率（收入最低 10% 的人的收入与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的收入之比为 1:3），资本不平等是基于 1/70 的十分位比率（财产最少的 10% 的人拥有的财产与财产最多的 10% 的人拥有的财产之比为 1:70），所以毫无疑问地，一个工资社会比财产社会更加平等。下面的果球状形 (Strobiloid) 图示 (Chauvel, 1995) 提供了两个社会体系的图解比较，这个比较分别来自工资社会和财产社会的不平等。工资社会的结构是基于大量的中产阶级〔或者，更准确地说，“中等阶级”(median class)〕和较少的极端情况（较少的富人、~~较尖的穷人~~），然而财产社会意味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很大。

但是现在，法国是时候像其他后工业化国家一样，去分析向工资社会改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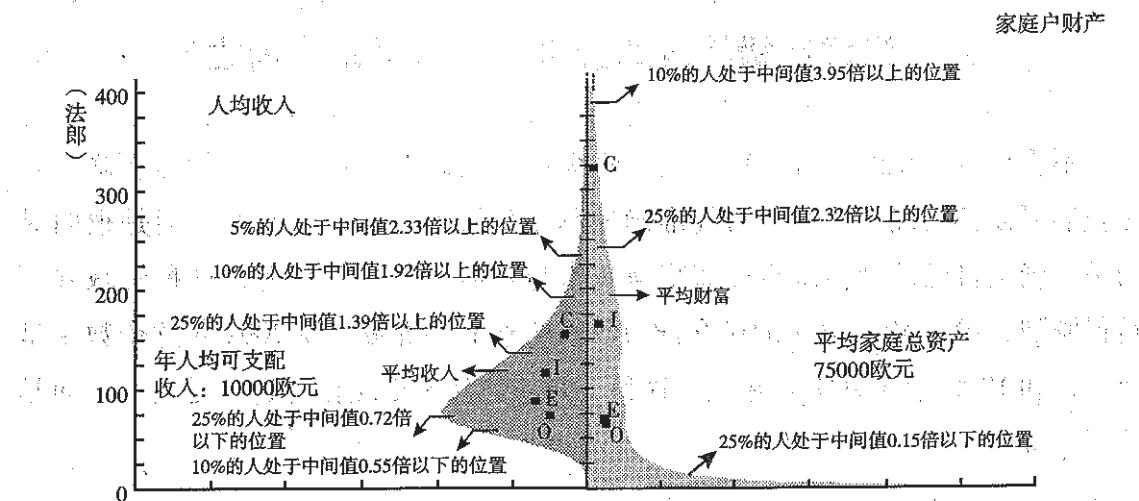


图6 法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图（2000年法国家庭预算调查数据）

资料来源：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1995年 budget des ménages survey 调查数据；家庭资产数据来源于1992年 actifs financiers 调查数据和2000年 reevaluation for year 调查数据。

注：图中中轴线附近的 C、I、E、O 所标示的各个点分别代表各类职业从业者的平均收入和平均财富。C 代表干部（高层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I 代表中等职业（低层专业人员和中层白领），E 代表雇员（低层白领即普通办公人员），O 代表蓝领工人。——编者注

后果。如果给予社会行动者强烈的刺激以使他们建立基于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未来预期，那么新的“财产福利”社会就产生了，它的形状就接近于 1:70 十分位比率。这样一个趋势的潜在结果是“30 年荣景”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将会产生极为深刻的不稳定变化：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中等阶级（median class）如今正处于破裂当中，在上升和坠落为碎片的夹缝中徘徊。

由于社会代际的稳固性进一步扩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虽然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从更易渗透的社会边界和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中有所收益（Vallet, 1999; Thélot and Vallet, 2000），但是我们从法国当前社会改革的趋势中依然感受到了“再阶层化”（restratification），这可能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大众阶级”成员感受到了一种社会性衰落，而美国的“大众阶级”在过去 20 年里也经历了这种衰落。

这种对客观趋势的广泛诊断告诉我们：大众阶级不仅面临着要接受中等阶级化理论的相对性，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关注“阶级消亡”论题的证伪（波普尔式的用语）。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看不到当代法国社会中清晰的阶级构成呢？

六 当代阶级构成的身份认同特征正在消亡？

不管再阶层化的客观趋势如何，阶级意识继续在持续和有规律地下降。虽然我们可以怀疑民意测验是否能准确地测量阶级成员意识的衰减，但是很明显的是，确定自己的社会阶级归属变得越来越过时了。尽管如此，这种衰减并不是很剧烈：1975年，68%的民众认为自己属于某个阶级，在2002年这个数字是55%；和1966年（61%）相比，这种下降趋势甚至更缓慢。这不是消亡，而是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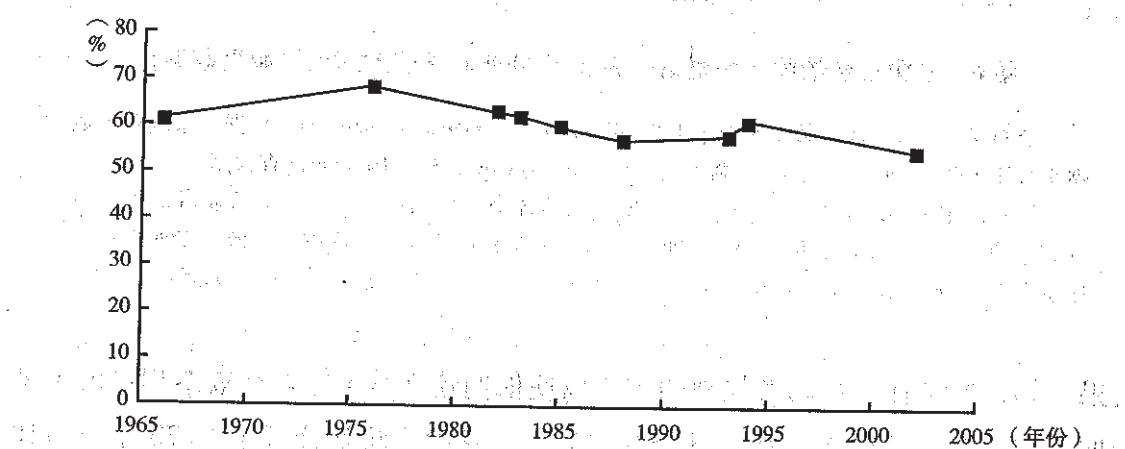


图7 被访者回答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级的比例（1966~2002年）

资料来源：1994年前的数据来源于 IFOP en 1966 et SOFRES de 1976 à 1994 (Michelat and Simon, 1996)；其后的数据来源于 2002 年法国选举追踪数据调查 (Panel Electoral Français 2002)。

其他资料和译著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判断：工会成员的减少，法国共产党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早期有21%的选票，2002年只有低于5%的选票），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地方组织的衰落，这种共产主义者协会的衰落促进了集体宣传、终身教育和议会斗争，并且扩大了各种社会主义化的基础。过去“大众阶级”的组织可以对公众价值和规范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导致高比例的政治参与度，并且能够把“大众阶级”清晰界定为某个群体，但是新的体系却是模糊的。首先，对阶级成员的主观分析说明，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雇员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中的成员。他们期望融入较高地位群体与他们所处的客观社会条件（收入停滞，工作弹性，等等）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大众阶级”的主观不稳定

性很强，他们越来越不是集体行动者了。现在，客观上构成的工人阶级同样也是主观上日益分裂的小群体，由于社会疏离性增强，他们面临着不断增大的风险。相反，上层资产阶级的主观特征和集体意识似乎由不同的动力支配着，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是目前唯一一个真正的“自在和自为”（Pinson and Pinson-Charlot, 2000）的阶级。

七 阶级的螺旋上升以及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断裂

客观上的再阶层化和主观上阶级意识的破裂相混杂的趋势要求我们对过去两个世纪的阶级变化进行重新判断。事实上，许多社会分析家都将他们对“阶级消亡”的分析建立在阶级意识消失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已经强调：社会阶级构成的客观和主观方面不是共线性的，对主观趋势的评价并不能提供真正客观发展的确证。我们现在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考虑两个维度（见图8）：第一个维度（水平方向）是客观阶级特征的强度，如不平等的强度、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强度，以及其他物质维度；第二个维度（垂直方向）是阶级形成的主观强度，如意识、政治动员、“社会交往”（rapport social）的强度等。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两个维度是互补地独立着，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复杂地关联着。当我们综合考虑这两个相互补充的维度时，一个更大的阶级变化的体系就产生了，四个理想类型的分类首次被揭示出来。上层右边位置的是“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在他们各自的范畴中客观和主观方面都是完全对立和相反的；下层的左边位置（“无阶级社会”）是另一个相反情况，在主观和客观方面紧张度都很低。一个常识假设是双方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社会系统。而我们认为实际上其他两个位置常常是被忽略的：强烈的阶级冲突伴随着较低的不平等，以及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胜利”的时代以及对工人阶级而言较低的客观阶级差异和较高的阶级意识。与此相反，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在“疏离”的情况下，强烈的不平等和较低的社会意识相匹配，正如当代美国社会所展示的那样（Chauvel, 1995; 2001）。

这个四个理想类型体系最吸引人的方面是没有哪一极是内在稳定的。事实上，矛盾的对抗意味着清晰的张力动摇着每一极。“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的第一极很可能延续了最终会影响重新分配和平等化的社会斗争而非社会缓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很难维持的，因为低的不平等可能产生更少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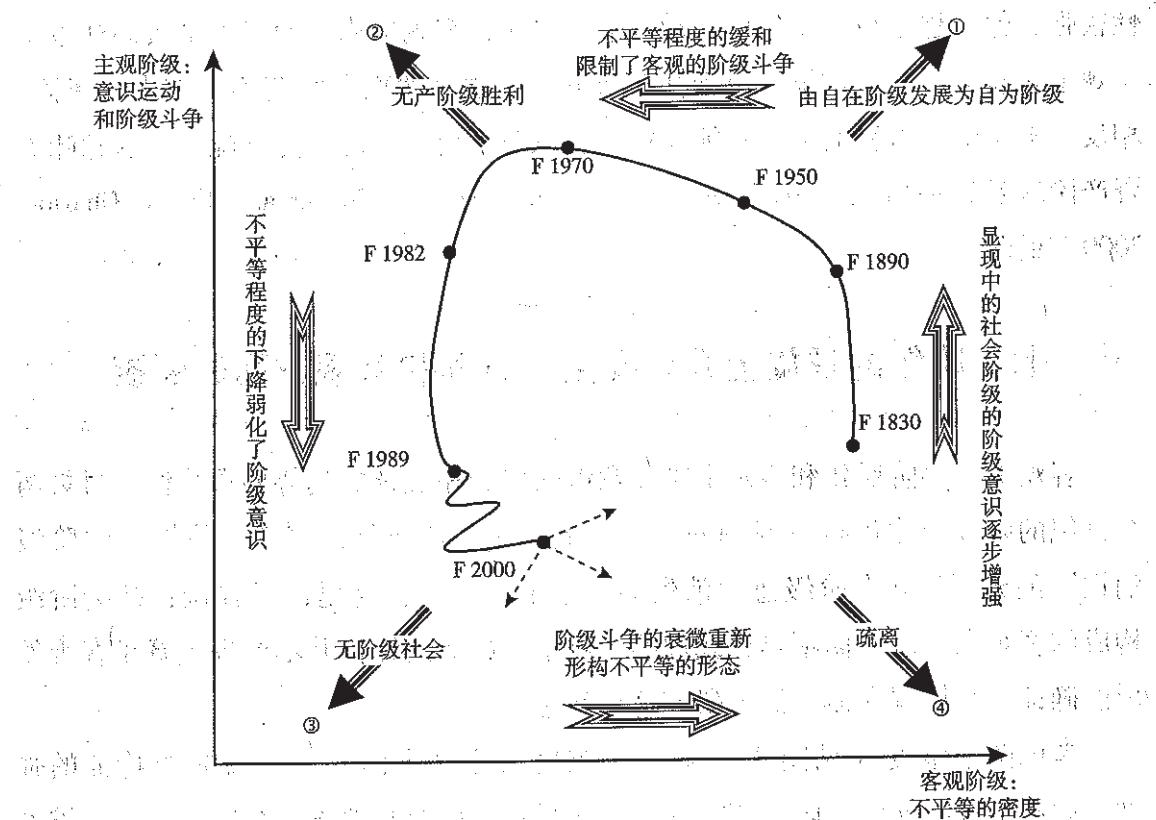


图8 历史上社会阶级的螺旋上升

注：图中X轴（横向轴）代表客观阶级形成的强度，Y轴（垂直轴）代表主观阶级形成的强度，图中的曲线代表不同年代客观阶级与主观阶级的形成程度。图中右上角代表类型①“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即在客观和主观层都形成了阶级；左上角代表类型②“无产阶级胜利”，即存在着很强的阶级意识但实际的（客观的）不平等程度不高；左下角代表类型③“无阶级社会”，即客观的不平等程度低并且也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右下角代表类型④“疏离”，即客观的不平等程度高但阶级意识弱。由图中的曲线走向来看，19世纪初是处于“疏离”状态，之后阶级意识强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至中期是“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阶级意识较强、工人运动发展并因而导致不平等程度减弱（“无产阶级胜利”），20世纪后半期阶级意识急剧弱化，不平等程度缓慢下降，形成“无阶级社会”，即主观和客观的阶级都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程度（客观阶级）有所上升，但阶级意识（主观阶级）继续弱化，这形成了另一种“疏离”（主观与客观阶级向相反方向发展）。图中显示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表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编者注

意识和减少对社会不平等的兴趣，而带来更多的文化冲突和象征区别（Pakulski and Waters, 1996）；另外，需要对新一代进行很强的社会化，而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他们被寄望承受的强烈社会冲突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无阶级社会”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港湾，但是内在的经济张力可能刺激统治阶级扩大他们控制经济行为的愿望，以便增加他们在集体产品分配上的经济份额，而且这个很可能发生，因为

缺乏清晰民意的组织很可能阻碍人们对浮现的剥削征兆进行集体谴责。最后一极“疏离”更可能是新轨道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急剧发展的不平等如何能不导致新的社会冲突、批评、谴责，如何能不产生针对新的经济划分的受害者而发起的主观动员。这样一个体系可以用来总结法国的变化：从1830年^①到21世纪早期。在此期间，后“30年荣景”形成的类似“无阶级社会”正逐渐转向并在各方面正日益趋近着工人阶级“疏离”的社会。当然，后一个阶段的历史还没有完成，但是，新的“大众阶级”组织的缺乏削弱了它对抗上层阶级自身致富欲望的力量。当代法国还没有像美国发展得那么快，在美国，工人和职员已经感受到他们收入的大幅下降以及他们集体组织的退化。对法国来说，改革更为复杂，对这个趋势有很多强烈的反对力量，但是2002年的总统选举预示着强烈的疏离信号，在那次选举中，有大量的民众投弃权票而使得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迅速增长。

八 社会化障碍和欧洲政治

目前的问题是无意识的客观社会阶级的出现。这些没有被主观上组织起来的客观阶级对民主化的影响结果是很不确定的——2002年法国选举已经体现出了一些。当大多数人面对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无法应对社会情况时，不稳定的集体形式就出现了。这种矛盾以及社会阶级变化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不匹配的潜在后果就是社会化障碍：在社会处境和日常面临的真实情境中人们所感知到的价值观、道德、意识形态和表现形式之间缺乏一致性，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关系。

这不是简单的默顿失范理论的问题，该理论牵涉到在渴望和满足这些渴望的社会可能性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但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分歧。个人主义和自主提供了这种搭配不当的清晰的例子（Castel, 1995）：人们服从于某种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让他们以个人主义式的、自主的和对自身行为完全负责的方式行事。同时，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来说，那些从社会角度来看应该由独立自主的

^① 我们提及1830年是作为工人阶级“觉醒”（prise de conscience）前的一个时期。激烈的社会冲突出现在1848年并且在20世纪的上半期达到高潮。汤普森（Thompson, 1963）关于阶级形成的问题在社会学里仍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

个体来行使的经济手段，也越来越少见了。因为这种让人们无法获得自主的社会过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清楚的，这种新的不平等的受害者无法表达他们所经历的分裂。

不管对自主的需求和不自主的实际限制之间的搭配不当这一社会感受的外在集体表现形式如何，大量失败的内化导致了一种痛苦的原子化。年轻人更多地在主观自主的背景下进行社会化，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真正自主；由于缺乏实现自治模式的集体手段，其他人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不安，这种不安阻止了这些人一起去承认在他们明显的失败中包含的失望，这种失败是由于缺乏满足自主模式的集体手段。一个正确的社会化应该鼓励这样的理解：只有少数特权群体可以获得自主，而大部分人应该找到他们社会发展所需的集体资源。

在一种新的所需行为和社会方式相互调整的阶段出现之前，大量大众阶级的社会化障碍将会加速向一种强烈的客观经济阶层分化而主观上日益无意识化的阶级体系过渡。这种搭配不当的潜在政治后果是巨大的。请记住这一点，让我们简单看一下最终的矛盾结果，它是关于减少客观阶级地位和表现形式之间的搭配不当而造成的复杂波动。一方面，对阶级问题的再认识在社会学中出现，新的对社会阶级的再评估成为当代社会学分析的重要内容（Bouffartigue, 2004; Chopart and Martin, 2004）——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显著的面向阶级议题的认知转变。同样，就真正的人们行为的客观方面而言，对 2005 年 5 月欧洲宪法条约法国全民投票的一种解释（见表 3）是：工人阶级和现在的中下阶级反对欧洲的市场化，因为这是一次潜在的基于社会阶级的重现来实现的政治动员。

表 3 在法国进行的两次欧洲公民投票中表示“赞同”的社会职业群体

单位：%

职业分类	《Maastricht 条约》公投 (1992 年 9 月 20 日)	《欧洲宪法条约》公投 (2005 年 5 月 29 日)	赞同率的变化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66	67	1
自雇者	49	53	4
半专业人员和低层管理人员	55	46	-9
普通办公人员	47	37	-10
蓝领工人	43	30	-13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与蓝领工人的差异	23	37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1995 CEVIPOF microdata 数据库的数据和 2005 CSA 法国选后调查数据计算所得。

九 欧洲中产阶级的飘零

如果在欧洲，收入分配金字塔形态的顶层和底层出现新的两极化，那么欧洲的“中等阶级”（靠近中间的社会群体）面临一种新的压力。在“30年荣景”期间，欧洲大陆中产阶级的动态变化基于三种主要的因素：①在经济增长方面，中产群体增加了200%的收入，②经济平等化（经济同质，因为十分位比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8.5降到70年代后期的3.5），并且③一体化和保护性的国家福利的扩大，减少了个体和家庭在期望和生活机会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事实上，在前一阶段获益的社会群体正在面临一种强烈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将会导致以前的中等阶级化趋势的动摇。

事实上，社会的中间群体从来都不是同质的，而且在理论上分析这些中产阶级的差异是很重要的。古斯塔夫·舒曼勒（Schmoller, 1897），这个德国社会科学家和强烈支持“俾斯麦福利政体”（Bismarck Welfare Regime）的学院派人物，是第一个强调这种差异性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中产阶级绝对贫穷化的批评，舒曼勒利用经验事实证明了中产阶级（Mittelstand）的重构，新的中产阶级（Neue Mittelstand）将会出现。以一个新的在工业化社会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为背景（Charle, 2003），在政府机构主导的工业部门和大型的服务公司（如保险公司、银行等）中出现的一批新的官僚以及新的、熟练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将会改变社会学意义上的德国社会的构成。考虑到这些中产阶级的异质性，舒曼勒提出两个主要的维度来描述这些差异（见图9）。

第一个维度是，存在上层中产阶级（Obere）和下层中产阶级（Untere Mittelstand）的对立，前者是通往精英的通道，而后者更靠近工人阶级的上层。

第二个维度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老中产”（Alte）和“新中产”（Neue Mittelstand）的对立——老的和新的中产阶级，前者包括自雇佣者、农民、工匠、监工，后者包括公共部门（Beamten）或者大公司（Angestellten）中的新的官僚/技术派（他们中的大部分处在强大的中央经济统制论的控制之下）。

上述两个维度的区别是让“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更加明显，新的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由舒曼勒（Schmoller, 1897）提出的——虽然爱德华·伯恩斯坦（Bernstein, 1889）更容易被人们在提到这个德国发明时想起。舒曼勒的“现代性”概念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欧洲地域的人们讨论的主要论题及其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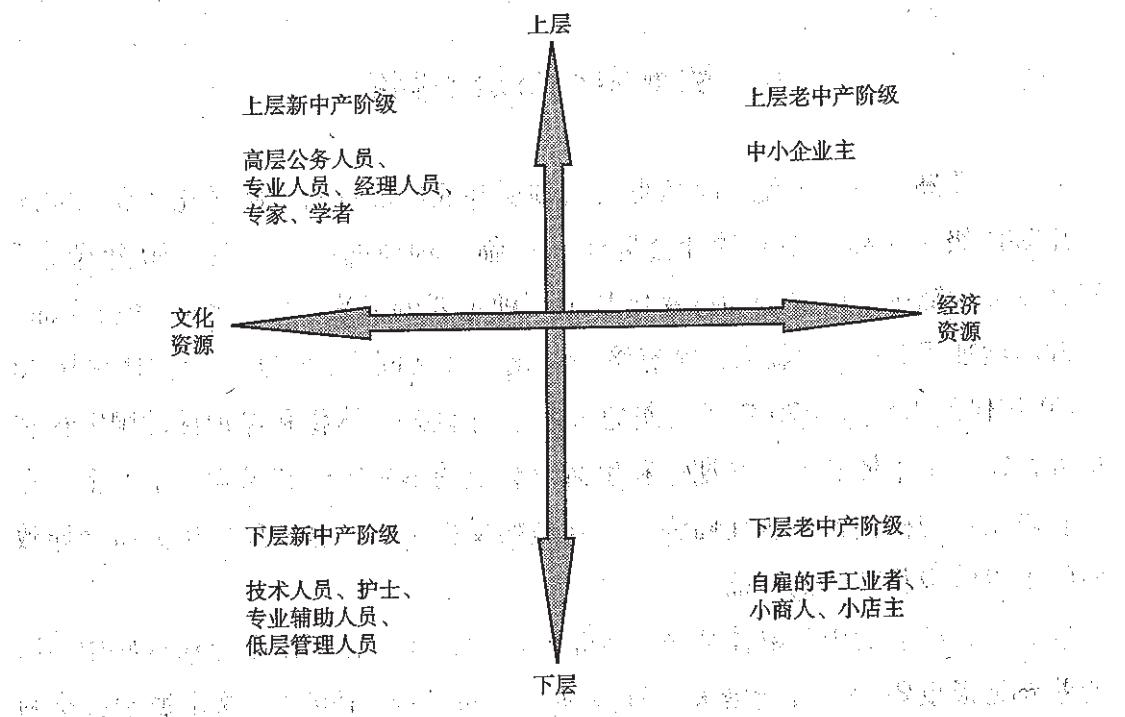


图9 舒曼勒的中产阶级社会空间图

于社会结构的辩论。从莱德勒和马尔萨克 (Lederer and Marschak, 1926)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阶级体系，到盖格 (Geiger, 1932) 强调中产阶级的 1929 年危机的政治影响，也包括《白领》(Mills, 1951) 这一目前为止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中产阶级扩张的最有名的社会学著作。^① 无论如何，1914~1915 年是关于新的中产阶级在数量和文化上扩张的讨论的冰冻期，很明显是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20 世纪 30 年代新的中产阶级扩张变化所产生的反作用效果。

如果我们使舒曼勒的两个维度交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图式，它能帮助我们辨别四种不同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最低的和最高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对应于早期资本主义传统的自我雇佣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最低和最高的新的中产阶级是两个基于可信赖的技术 (Wright, 1985) 或者文化资本 (Bourdieu, 1979) 的中产阶级。财产和文化或者市场和政府，甚至财产和知识、先赋和后致地位之间的水平矛盾，存在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有明显的旧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相互对立观点的西方社会学中。在通货膨胀和“食利者的安乐死”的背景下，

^① 实际上，在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学传统和美国的“黄金时代”之间所缺少的联系环节之一是莱德勒，20 世纪 30 年代末，他以难民身份来到纽约的社会学术研究新学院。

在资本主义财产控制能力的下降期间，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不管是低的还是高的）被认为可以代替基于财产的中产阶级。

这些观点在温和的社会党执政带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扩张阶段是正确的，以至于这些观点在 1955~1980 年的西方欧洲是很普遍的，主要是在撒切尔—里根时代之前，并逐渐扩大到西方世界。那时，这个新的中产阶级的特点是“中产阶级化”的三因素趋势：①经济增长给工人阶级的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②经济平等化（或者同质），这意味着新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利益的集中；③改革路线的社会性承诺，使得那些没有财产但有技术的中产阶级比那些传统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具有更大的优势。新的中产阶级的问题来自后来 20 年中这三个重要因素趋势的逆转。

这 20 年中面临的经济停滞不再给工薪阶层提供向上流动的传统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稳定也使中产阶级不再有任何扩大的可能；由于缺乏稳定工作而导致的新的社会风险增加了不确定感（在法国辩论中的 *précarité*）以及缺乏长远的期望，这些都破坏了以往的中等阶级化的趋势。更为根本的是，我们注意到“回归家产承袭”（repatrimonialization）的趋势，这对于以家庭积累作为个人福利基础是很重要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年青人即使在没有父母的帮助下获得早期自主也是可能的：工资水平高和住房免费（在社会性房屋上的大量投资造成了私人住房市场大量的贬值），提供了较早过渡到成人期的可能性，对于无财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是如此。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原初拥有者（*primoaccédants*，第一次拥有房产的人）是房子主人的孩子，他们是在父母的帮助下获得房产的。在保守的欧洲大陆银行体系，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净值等于他/她所能借到的钱。“回归家产承袭”的趋势意味着房主和租客越来越成为一种先赋成分了。另外，因为房价和其他类型的金融财产的价格一样在飙升，同时工资不变，所以工作收入对于有产阶级而言相对越来越少，因此对财富积累的控制越来越重要。

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文化资本减弱的趋势。因为大学毕业生的规模过度扩大，主要是在文化专业（历史、古希腊、人类文化学）上，当相对于这些教育人口的社会团体发展停滞不前时，我们可以测出现在这样一个明显的“教育降级化”（*déclassement éducationnel*）（见图 10）。这种变化并没有明显地涉及更多的市场技能和专业如工程、法律、商业或者管理，但是欧洲大陆在发展一个真正的知识社会时面临着比英国和北欧更大的困难：越来越多的擅长金融、计算机或者生物学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离开欧洲大陆，因为与这些艰苦的工作相比，欧洲大陆能够提供给他们的预期工资仍然远低于国际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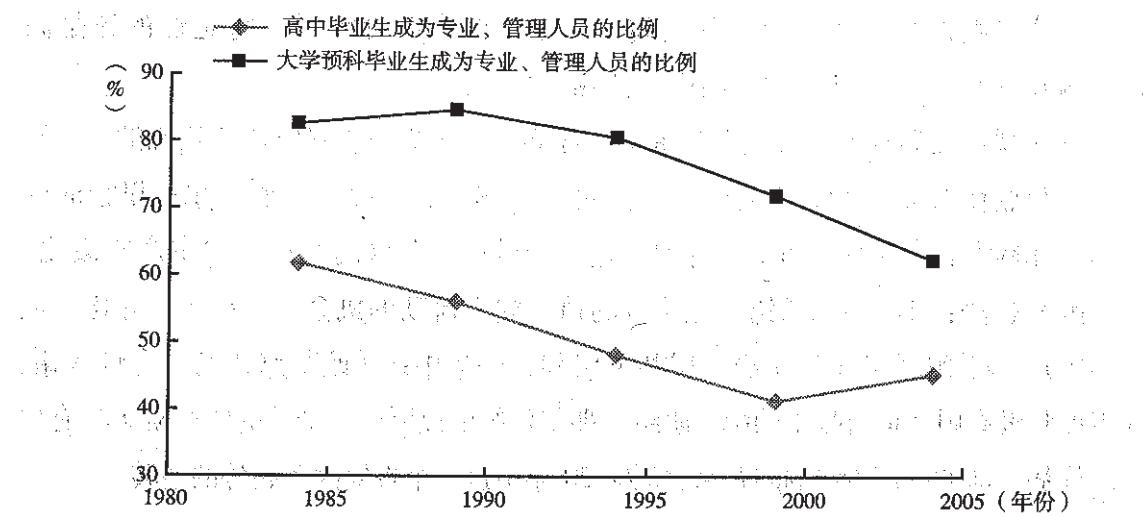


图10 高中和大学预科毕业生进入中高层白领的机会 (35~39岁人口)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1984~2004年法国就业调查。

“回归家产承袭”和“教育降级化”的累积导致1960~1980年间“新中产阶级扩大”的反作用效果；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所谓的新中产阶级中什么仍然是新的？”经济停滞、降级的危险、新的不确定感将会导致欧洲大陆强烈的文化悲观主义。不管怎样，真正发生的转向对应于一种反作用效果，即基于财产的中产阶级似乎充分利用了这20年的发展，而基于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则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这样一个结构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政治风险，因为文化中产阶级仍然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持。它们的经济衰退将会伴随着某种政治失败，这种政治失败很可能意味着在文明稳定性上的重大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 Aglietta, M. and A. Brender. 1984.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société salariale*. Paris, Calmann-Lévy.
- Aron, R. 1969. *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 essai sur la dialectique de la modernité*. Paris, Calmann-Lévy.
- Bernstein, E. 1889.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 Bidou, C. 1984. *Les aventuriers du quotidien: essai sur les nouvelles classes moyenn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Bouffartigue, P. (dir.) 2004. *Retour des classes sociales, inégalités, dominations, conflits sociaux*.

- Paris, d. *La Dispute*, pp. 55 – 71.
- Bourdieu, P.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Bourdieu, P. and J. C. Passeron. 1964. *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Bourdieu, P. and J. C. Passeron. 1970. *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Boy, D. and N. Mayer. 1997. Les "variables lourdes" en sociologie électorale, état des controverses. *Enquête*, 01/06, n°5, pp. 109 – 122.
- Castel, R. 1995.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une chronique du salariat*. Paris, Fayard.
- Charle, C. 2003. Les classes moyennes en France, discours pluriel et histoire singulière (1870 – 200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0 (4), 108 – 134.
- Chauvel, L. 1995. Inégalités singulières et plurielles: l'évolution de la courbe de répartition des revenus. *Revue de l'OFCE*, n°55, pp. 211 – 240.
- Chauvel, L. 1997. Les inégalités au fil du temps: 1954 – 1994. dans L. Dirn, *Tendances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Revue de l'OFCE*, n°61, pp. 201 – 207.
- Chauvel, L. 1999. Du pain et des vacances: la consommation des catégories socioprofessionnelles s'homogénéise-t-elle (encor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LX, pp. 79 – 96.
- Chauvel, L. 2001. Un nouvel âge de la société américaine. Dynamiques et perspectives de la structure sociale aux Etats-Unis (1950 – 2000). *Revue de l'OFCE*, n°76, pp. 7 – 51.
- Chauvel, L. 2002 (2e édition). *Le destin des générations, structure sociale et cohortes en France au XXe siècle*. PUF, Paris.
- Chopart Jean-Noël, Claude Martin (dir.). 2004. *Que reste-t-il des classes sociales*. Rennes: Ecole Nationale de la Santé Publique.
- Clark, T. N. and S. M. Lipset. 1991.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I, pp. 397 – 410.
- Desrosières, A. and L. Thévenot, 1988. *Les catégories socioprofessionnelles*. Paris, La Découverte.
- Dubet, F. and D. Martucelli. 1998. *Dans quelle société vivons-nous?* Paris, Seuil.
- Erikson, R. and J.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ischer, C., M. Hout, S. R. Lucas, M. Sanchez-Jankowski, A. Swidler, and K. Voss. 1996. *Inequality by Design: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toussi, J. P. 1995. *Le débat interdit*. Paris, Arléa.
- Fitoussi, J. P. and P. Rosanvallon (dir.). 1996. *Le nouvel âge des inégalités*. Paris, Le Seuil.
- Fourastié, J. 1979. *Les Trente Glorieuses ou la révolution invisible*. Fayard, Paris.
- Freeman, R. B. 1976.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eiger, T. 1932. *Soziologische Gegenwartsfragen, Heft 1: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Volkes. Soziographischer Versuch auf statistischer Grundlag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 Goldthorpe, J. H., D. Lockwood, F. Bechhofer, and J. Platt. 1968 – 1969. *The Affluent*

- Wo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Vol.).
- Halbwachs, M. 1905. Remarques sur la position du problème sociologique des classes.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3, pp. 890 – 905.
- Halbwachs, M. 1913. *La classe ouvrière et les niveaux de vie*. Paris, Félix Alcan.
- Héran, F. 1997. Les intermittences du vote: un bilan de la participation de 1995 à 1997. INSEE Première, 546.
- Kingston, P. W. 2000. *The Classless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derer, E. and Marschak J. 1926. Der neue Mittelstand. In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9 (1) 120 – 141, Tübingen, Mohr.
- Mendras, H. 1988. *La secon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5 – 1984*. Paris, Gallimard.
- Michelat, G. and M. Simon. 1996. 1981 – 1995: changements de société, changements d'opinion. In Sofres, *L'Etat de l'opinion 1996*. Paris, Le Seuil.
- Mills, C. W. 1951.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Nisbet, R. 1959.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cial Class.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2 (1), pp. 119 – 129.
- Pakulski, J. and M. Waters. 1996. *The Death of Class*. London, Sage.
- Piketty, T. 2001a. Les inégalités dans le long terme, dans T. Atkinson, M. Glaude, L. Olier, and T. Piketty, *Inégalités économiques*, *Rapports du Conseil d'analyse économique*, n°33.
- Piketty, T. 2001b. *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 au XX^e siècle: inégalités et redistributions, 1901 – 1998*. Grasset, Paris.
- Pinon, M. and M. Pinon-Charlot. 2000. *Sociologie de la bourgeoisie*. Paris, La Découverte.
- Poulantzas, N. 1974.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e capitalisme d'aujourd'hui*. Paris, Séuil.
- Schmoller, G. 1897. *Was verstehen wir unter dem Mittelstande? Hat er im 19. Jahrhundert zu oder abgenomm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 Simmel, G. 1981 (1896 – 1897). *Sociologie et épistémologie*. Paris, PUF.
- Therborn, G. 1995. *European Modernity and Beyond*. Londres, Sage.
- Thélot, C. and L.-A. Vallet. 2000. La réduction d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devant l'école depuis le début du siècle. *Économie et Statistique*, n°334, pp. 3 – 32.
- Thompson, E.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res, V. Gollancz.
- Todd, E. 1995. Aux origines du malaise politique français. Les classes sociales et leur représentation. *Le Débat*, n°83, pp. 98 – 120.
- Touraine, A. 1969.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Paris, Denol.
- Vallet, L.-A. 1999. Quarante années de mobilité sociale en France. L'évolution de la fluidité sociale à la lumière de modèles récent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Vol. 40, pp. 5 – 64.
- Wright, E. O.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right, E. O.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